

December No.7

第七期 2009年12月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Winter 2009

北京外国语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主办



出版人

金在烈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编委会顾问

周其凤 北京大学校长
顾秉林 清华大学校长
陈佳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纪宝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程 伟 辽宁大学校长
金柄珉 延边大学校长
Mai Trong Nhuan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Suren Davaa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禺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友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冯 俊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虎雄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bhouth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Algaa Solongoo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
郭栖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赵宗锋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主编 郭栖庆 赵宗锋
编辑 谷晨曦 王惠英
装帧设计 蔡颖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特稿

- 4 教育部授予金在烈博士“国际学术交流贡献奖”
- 5 北京论坛（2009）圆满落幕



学术活动

- 8 “图们江学术论坛2009”成功举办
- 10 “2009亚非学院国际会议—研究、网络与合作”成功举行
- 12 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 13 “国际儒学论坛·2009”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研究进展

- 14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中国
- 23 傅吾康对东南亚华文碑铭资料之搜集与研究
- 36 北京奥运的国际传播和中国形象的塑造

教育部授予金在烈博士“国际学术交流贡献奖”

为表彰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博士多年来在传播亚洲文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2009年11月9日，教育部在新世纪日航饭店举行仪式，授予金在烈博士“国际学术交流贡献奖”。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会见了金在烈博士，并向他颁发“国际学术交流贡献奖”。郝平副部长在致辞中指出，10年来，金在烈博士十分关注和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事业，在推动东方文化传播，提升中国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金在烈博士发表讲话，感谢中国教育部对其多年来在传播亚洲文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所做工作的肯定和鼓励，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中韩两国人文交流，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东方文化的传播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维教授代表国内接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的高校致辞。他指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一直关注东方文化，致力于促进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为促进中国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金在烈博士作为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事务总长，功不可没，获得教育部授予的“国际学术交流贡献奖”，当之无愧。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杨学义教授代表国内接受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资助的高校向金在烈博士赠送了纪念品。

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教授等中方有关高校领导、中国社科院有关司局负责人及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张秀琴司长出席了会见和颁奖活动。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

北京论坛(2009)圆满落幕



作为目前国际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论坛之一，创办于2004年的“北京论坛”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第六届年会——“北京论坛（2009）”于2009年11月6日-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主题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共汇集了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其中海外学者200余名，对人类所面对的危机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中国全国政协前副主席罗豪才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蒋树声出席了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外国嘉宾有：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先生，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高级顾问马歇尔·史密斯，韩国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韩国SK集团副董事长崔再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肯尼斯·阿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传统研究基金会主席赛义德·纳瑟，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出席开幕式的国内领导和学者有：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郝平，北京市副市长黄卫，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等。开幕式由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教授主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树声在致辞中表示，经过五年的发展，“北京论坛”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一年一度的盛事，发挥着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今年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为主题，将反思危机与和谐发展联系起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体现了论坛的远见卓识，全球性的危机

需要各国政府共同努力，需要各界人士一起为全球的和谐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他引用费孝通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表示构建和谐世界将是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唯一出路。

北京论坛自创办以来得到了联合国的大力支持。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曾为北京论坛的创办发来贺电，盛赞“北京论坛的主题与联合国的主题和任务是统一的”。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特意发来视频讲话，祝贺第六届北京论坛的召开。潘基文表示，全球的金融危机当前正处于关键时刻，联合国正在建立一套全球体系来监控危机的影响，警示人类注意未来的危险信号。北京论坛的主题正是致力于探讨这些全球问题，特别是对全球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追求，能够从危机当中站出来，重振旗鼓，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努力奋斗，走上一条全世界人们更具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先生在致辞中表示，第六届北京论坛的举办正值64届联大召开之际，联大的召开表明全球正在直面世界的挑战，当下是一个共同面对全球危机挑战的时代，全人类分享一颗星球、一个家园。他认为，第六届北京论坛的主题恰当其时，人类必

须要共同面对危机和挑战进行反思，实现和谐发展，他预祝2009年“北京论坛”可以为人类共同的事业做出实质的贡献。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郝平从世界文化多样性角度盛赞北京论坛的连续成功举办，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是中外文化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他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创新和和谐的源泉，而教育在文化多样性推动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催化剂和媒介的作用。他表示，中国教育部会积极支持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执着的努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一起为世界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的目标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韩国SK集团副董事长崔再源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雄厚的实力、真实的成就以及它的内在魅力，这种魅力蕴含在每一位北大学子、每一位北大教授、每一位北京市民以及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北京论坛的交流传达了一种敞开心扉、沟通交流的精神和一种真正彼此尊重的对话和了解差异的精神，正是凭借这种精神，北京大学才能够成为中国的人文会所之一，北京才能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中国才能肩负起成为全球和谐与繁荣中心的大任。



北京市副市长黄卫指出，“北京论坛”致力于推动跨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为弘扬和谐精神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把北京建成学习型、创新型的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和北京市政府提出要继续发扬奥运精神、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是一致的，将充分展示北京这座文明古都的文明底蕴和开放气象。他希望论坛能够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人类的发展贡献智慧。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代表北京大学对北京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北京论坛的使命就是为世界范围内哲学与社会科学学者的“通力合作、共度时艰”提供制度化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外学者针对

迫切的现实问题寻求对策和理路，力求在学术研究与社会进步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思想空间，努力促进文明和谐的实现。他表示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各位专家学者一定能够通过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发现和提炼出更多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观念，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实现认识上的新飞跃。



在开幕式后的主旨报告环节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作了题为《经济理论与金融危机》的报告；世界著名伊斯兰哲学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赛义德·侯赛因·纳瑟（Seyyed H. Nasr）发表了题为《天、地、人和谐及不同文明的和谐》的演讲；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也分别作了题为《一个多重与多元文明的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的主旨报告。

本届论坛共设“金融危机：挑战与应对”、“危机影响下世界格局的变化与调整”、“化解危机的文化之道——东方智慧”、“危机与转机——对现实问题的历史反思”、“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对策与发展”五个分论坛。此外，论坛与哈佛-燕京学社、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合作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基层动员：城乡比较”、“危机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前景”和“危机中的世界：外来压力、内部影响与中国应对”三个专场以及一场题为“对二十一世纪人类困境的回应”的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吸引了无数来自北大和周边院校的师生前来旁听，现场座无虚席，讨论气氛异常热烈。

11月8日，历时三天的第六届北京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落下帷幕。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钱联平、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先生分别致辞。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岩松等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学者出席了闭幕式。仪式由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主持。

闭幕式上，周其凤校长高度评价了本次论坛，对各位嘉宾为论坛的成功举办所作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并

摘录了部分学者的精彩观点与大家分享。他指出，来自海内外的嘉宾们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以及在寻求危机解决之道时所体现的包容与热诚，使本届北京论坛兼收并蓄，收获了丰硕的思想成果；同时，与会学者以冷静的反思对危机的产生做出了精彩的阐释，也提供了许多令人振奋的解决方案，让我们看到一幅充满转机和希望的未来图景。

针对本届北京论坛主题“危机的挑战、反思与和谐发展”中的“危机”一词，周其凤做了解读：在汉语里，“危机”是一个多义而辩证的词汇，它可以代表眼前的危险，也指向可能的出路，它常常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时刻。他希望北京论坛能够启发大家在深度与广度上对危机加以反思，在思想与理性的指导下联合起来，直面挑战，共创和谐。

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钱联平在致辞中表示，本届北京论坛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不仅引起了诸多媒体的关注，也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认可和赞赏，北京论坛已经成为北京的一张学术名片，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他指出，北京论坛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这种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显得更加重要。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先生随后致辞，他用“感动与美丽”形容第六届北京论坛的圆满举办。他并指出，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邀请世界各国的学者进行文明的对话。北京论坛具备北京特有的文化韵味，而北京又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的历史和神韵的，北京论坛又是全世界的知识精英共同担忧人类文明发展的学术盛宴。致辞中，金在烈先生用韩语、中文、英语邀请全世界的学者来北京论坛——“明年再见！”

闭幕式上，周其凤校长代表北京论坛组织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宣布第七届“北京论坛”将于2010年11月5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在《友谊地久天长》的乐曲声中，北京论坛（2009）圆满落下帷幕，不少学者互道“See you next year”，期待明年的相聚。

此外，作为北京论坛的又一文化品牌“北京论坛之夜——走进芭蕾专场文艺演出”于11月7日晚在北大百周年讲堂盛大举行。继2007年中国艺术家室内音乐会、2008年东亚四国大学大型合唱音乐会之



后，中央芭蕾舞团荟萃东西方艺术精华的精彩演出，从艺术领域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诠释了北京论坛的总主题：“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北京论坛经过六年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国际影响力与关注度不断提升。历时三天的北京论坛（2009）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高等教育等不同角度全面梳理了与危机相关的重大命题。嘉宾们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以及在寻求危机解决之道时所体现的包容与热诚，使本届北京论坛兼收并蓄，收获了丰硕的思想与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将从实践层面为当前及未来危机的应对与解决提供智力支持，从而进一步为人类文明的和谐与繁荣做出贡献，这也是北京论坛自始以来的宗旨与信念。

北京论坛组委会办公室



“图们江学术论坛2009”成功举办

10月17日至18日，由延边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承办的“图们江学术论坛2009”在延边大学综合教学楼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延边大学校长金柄珉、朝鲜社会科学院院长太亨哲、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金虎雄出席论坛开幕式。开幕式由延边大学副校长崔炯谟主持，延边大学在校学生百余人听取了报告。

本次论坛主题为“多元共存与边缘的选择”。与会学者80多人，其中提交论文的朝鲜学者16人、韩国学者12人、日本学者4人，国内大学及研究机构学者12人。

延边大学金柄珉校长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指出，延边大学创办“图们江学术论坛”的宗旨是，通过推动东北亚区域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对话问题的研究，促进东北亚地区、亚洲乃至世界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全人类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他强调，图们江流域文化变迁是世界多元文化互相碰撞、冲突、汇集、融合的路径和典型缩影，是世界文化“和而不同”形成和本体史实，更是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汇集、交融乃至提

升为人类文化普遍性的“灿烂边界”。

太亨哲院长、金在烈总长在会上分别致辞。

开幕式后，进行大会交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宁作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和文化认同》的报告，延世大学国学院院长白永瑞教授作了题为《亚洲的多样性与生活中感受的东亚——韩国人的视角》的报告，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院教授金宽雄作了题为《满族的“长白山三仙女”——考证学的视角》的报告，朝鲜社会科学院主体文学研究所所长高喆焄作了题为《关于抗日革命文学中体现的民族性的考察》的报告。

17日下午和18日上午，与会学者分三组就“边缘文化的变迁与互动”、“民族互动的实像与虚像”、“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与开发”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18日下午论坛闭幕。延边大学副校长崔炯谟在闭幕式上致辞。他指出，本次论坛通过发掘图们江流域所独具的地缘政治以及文化上的独特价值，弘扬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边缘文化的价值，达到了预定的目标。他希





望，今后有更多的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来到延边大学，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展开热烈的讨论，汇集国内外学术资源，打造更高水平的学术平台，促进多元文化发展，并通过这种努力，来达到“图们江学术论坛”的长远目标。

第三届延边大学“卧龙学术奖”颁奖仪式也于18日下午在综合教学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延边大学校长金柄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出席仪式。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金虎雄主持仪式。

“卧龙学术奖”是为表彰在中国的韩国学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而设立的奖项。该奖项由延边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设立，奖金额为1万美元，今年是第三次颁奖。这次“卧龙学术奖”受奖人员是：中央民族大学朝鲜文学教授吴相顺、延边大学人文学院朝鲜历史学教授金成镐和朝鲜——韩国语学院朝鲜语言学教授崔允甲。延边大学校长金柄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分别在会上致辞。延边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朴灿奎介绍了获奖者的简历。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09亚非学院国际会议—研究、网络与合作” 成功举行

2009年10月23日,“2009亚非学院国际会议—研究、网络与合作”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开幕,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法国远东学院、韩国外国语大学、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世界顶级亚非教学与研究的机构的院长们汇聚在北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共同探讨世界范围内亚非研究和语言文化教学。国家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杨新育女士、教育部外语非通用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刘曙雄教授、联合国教科文高等及远程教育专家王一兵教授、亚非学院的全体教师和客座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君副书记致开幕词,她首先对来自全球知名亚非研究院校和机构的与会代表以及国内同仁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充分肯定了亚非学院在过去近50年的时间里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为加强中国和亚非国家的交流和联系做出的重要贡献。她表示北外高度重视亚非研究领域,希望与会的各所亚非学院间建立长期的联系,甚至建立固定的机构,为保持合作关系奠定基础,并预祝“2009亚非学院国际会议—研究、网络与合作”取得圆满成功。

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亚非研究走向”、“亚非研究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亚非语言文化研究”和“亚非学院教学科研路径交流”等议题畅所欲言,展开讨论,充分互动。与会者普遍认为,伴随着亚洲的崛起和非洲的战略意义凸显,亚

非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正在以极高的热忱加大对亚非国家语言、文化和社会研究的关注和投入。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不仅在亚非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而且还在某些领域走在前沿,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东方学研究,特别是亚非研究来说,中国的亚非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北外的东方语言文化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学术成果。就亚非学院来说,邓殿臣教授的《南传佛教研究》至今仍是从事佛教研究和南亚研究的

必读书,而邱苏伦教授翻译的《大唐西域记》泰文版在泰国不断再版,受到了泰国学术界和民众的高度评价,郑于中先生所编纂的《僧伽罗语语法》和《中僧词典》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而北外阿拉伯语、日语、中文、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学术上更是硕果累累。例如阿拉伯语专业纳忠先生所写的《阿拉伯通史》是中国学术界阿拉伯研究的最高成就,2001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沙迦阿拉伯文化贡献奖”的殊荣。北外的日本学研究中心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唯一一个日本学研究中心,它现在已经成为整个中国日本研究的最重要的推动者,而北外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和发展展开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东方学研究无论是在语言教学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层面,都在中国的东方学语言教学和学术研究上具

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学术地位。因此，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在亚洲和中国高速发展的今天，东西方的学者应该在亚非语言教学和研究上联合起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科研等方面展开全面务实合作。

23日下午，与会各方讨论并最终签署了《亚非学院国际合作备忘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亚非学院的联合教学与研究的网络，即“全球亚非学院网络”

(INAAI)，在青年教师互访、学术资源共享、学生暑期项目等方面相互分享、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成长。与会各方还同意基于“全球亚非学院网络”框架下创办《全球亚非学院网络通讯》，以加强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反映全球亚非研究的最新成果，跟踪最新的亚非研究动态。同时，今后将积极努力使“全球亚非学院网络”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一个常设机构，从而使合作走向制度化，稳定化。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孙有中教授致闭幕词，他指出，在过去的两天中，来自教育部的领导和北京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同仁，来自法国、俄罗斯、美国、韩国的亚非研究和语言教学单位的学者在北外探讨了世界范围内亚非研究和语言教学的关切问题，也达成了要积极合作、共建交流网络平台的决定。这是北外亚非学院以及各参会院校和全体与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对此次会议取得重要成果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认为，召开此次会议并商讨建立一个全球亚非研究机构合作和沟通的平台具有战略性意义，各方可以在此平台上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从而对全球范围的亚非研究活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次“2009亚非学院国际会议—研究、网络与合作”，为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视角、不同背景的亚非教学与研究活动提供了交流机会，会议的成果不仅仅会使亚非学院在语言教学和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以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厚重的学术基调，做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水准的亚非研究。同时，它的成果必将带动北外的整个东方学科研究，突破现存的专业、学科的界限，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相互推动，从而形成多学科、多语种相互交融的新局面。

此外，会议还吸引了众多国内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等对会议进行了全程报道，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杨晓京、孙晓萌



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2009年11月1日至3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承办的“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丛刊》杂志主编吴福辉、斯洛伐克科学院高力克教授、瑞士汉学家、翻译家冯铁教授、韩国学者金宰旭等海内外100多位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是对现代文学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的梳理和总结。会议共收到论文近200篇，有50多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会议按照日程和不同主题，分14个分会场进行。学者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其中既有宏观的理论探讨，又有围绕具体的文学史、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的史料研究。

令人可喜的是本次会议不仅涌现出了一批中国现

代文学及其史料研究的后起之秀，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研究。如中国现代文学馆于润琦的“唐弢馆藏管窥”、河北大学文学院熊权的“时代思潮中的‘恋爱与革命问题’——关于‘革命加恋爱’文学发生的新解”、广东佛山大学文学院巫小黎的“《亦报》研究”、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周佩瑶的“《学衡》年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许祖华的“鲁迅与音乐”，深圳大学王素霞的“当‘涓生’遭遇‘鲁迅’——论《伤逝》叙事技巧的些许遗憾”、河南大学文学院张先飞的“五四新文学家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史观研究”、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蓉的“肉欲迷狂中的身体转向——以‘灵肉观’为中心看《幻洲》”、广东惠州学院中文系肖向明的“革命‘召唤’——论‘土改’和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民俗叙事”和北塔的“英语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诗歌”等等。

在会上，学者们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讨论。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深刻地指出：“文学研究者要从学会史料考证开始，要‘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只有崇真黜伪，少一点虚文，多一点实学，文学史研究才有希望。”

中国现代文学馆于1985年正式成立，是国内唯一一家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其主要任务是收藏、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即将建成的二期工程还设有专门的研究室，将拟定相关课题，邀请海内外的学者来馆研究与交流。中国现代文学馆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赵倩

“国际儒学论坛·2009”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12月5日至6日,“国际儒学论坛·2009”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国际儒学论坛”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与亚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专题国际学术论坛。自2004年举办第一届以来,每年定期举办一届,已经连续举办六届。国际儒学论坛·2009的主题是: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会议代表参与。

出席大会的有: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滕文生,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长金在烈,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理事长、早稻田大学原校长西原春夫,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育部国际交流司副司长于继海,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曹凤泉,以及清华大学钱逊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韩国成均馆大学李东俊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李承焕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川原秀成教授等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大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主持。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代表教育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郝平副部长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培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而且传播到海外,影响了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向。面向21世纪人类的冲突和挑战,儒家思想同样也能够成为我们重新思考安身立命之道的重要精神资源,为构建人类美好家园做出重要贡献。

纪宝成校长代表中国人民大学致欢迎辞。纪宝成校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启发个体的内心自觉,提倡安身以崇德、修身以立命。这实际上就是启发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最高理想。本次国际儒学论坛将



主题确定为“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很有意义的。儒家的人文传统,虽然有其时代性和历史性,却也具有着超越性的意义。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长金在烈先生也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金在烈先生指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亚各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儒学、发展儒学,是化解人类共同的危机和冲突的文化源泉,是实现和谐东亚与和谐世界的精神保障。要构建现代化的人类社会,首先就是现代化的“人”的培育,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为现代人的培育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资源。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性儒学学术交流平台,本论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共收到会议论文83篇。论坛共设置了“内圣外王”、“修养与教化”、“儒家思想的历史传统”、“儒家身心理论的宗教向度”、“儒、释、道、耶身心理论的比较”、“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等六个讨论主题,十五场分组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各个主题,或梳理儒家关于“内圣外王”、“修养与教化”的思想,或分析其理论架构,或比较儒、释、道、耶各文化的异同,或探讨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同时也就上述论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中国¹

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 陈文力

【摘要】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近些年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东亚合作已成为亚洲区域合作中富有活力、前景广阔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却明显滞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更加凸显了加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中国的参与对东亚合作的发展来说举足轻重,中国应在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同时,也为东亚及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经济一体化 东亚 金融危机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随着世界经济总量的扩大,各国、各地区经济资源配置不断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达到更高的水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以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区域合作既是各国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也是相邻国家为减缓全球化无序冲击而进行的合理选择。

近些年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东亚合作已成为亚洲区域合作中富有活力、前景广阔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物质条件

“东亚”概念在不同场合有不同内涵,有时特指东北亚地区,不包括东南亚在内;有时则指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区域。某些时候,“东亚”概念等同于

“亚太地区”的狭义概念,即“太平洋的亚洲地区”或太平洋西岸的亚洲。本文研究的“东亚”指的是以独立国家为划分基础,主要指东北亚五国和东南亚十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和东盟各国,这和世界银行对东亚区域划分的标准基本一致。由于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构成了东亚经济的主体,占整个东亚地区GDP总值的90%以上,而蒙古和朝鲜的经济总量在东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低,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四个经济实体之间的一体化,但这并不否认蒙古和朝鲜参与其中的积极意义。

(一) 现代化进程相近

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利用西方工业化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机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创造了在集权政治下经济得以飞速发展的“东亚模式”。进入新世纪后,它们又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至少进行了三次宏观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年均增长高达10%以上,从而使经济总量不断增加,发展质量不断提高,现代化进程加速进行。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国际统计数据(2008)”,中国主要指标居世界的位次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很大提高,如表1所示,到本世纪中叶将跨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行列。东盟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虽不均衡,但也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等措施努力实现本国的工业化。因此,就目前而言,东亚各主要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是相近的。

表1: 中国主要指标居世界的位次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文发展报告》2007/2008年。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课题成果。

Source: FAO Database; UNSD Database; World Bank Database; IMF Databas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指 标	1978	1980	1990	2000	2005	2006	2007
国土面积	4	4	4	4	4	4	4
人 口	1	1	1	1	1	1	1
出生时的							
预期寿命①	75(169)②	77(173)	83(186)	88(190)	86(216)		
国内生产总值	10	11	11	6	4	4	4
人均国民							
总收入①	175(188)	177(188)	178(200)	141(207)	128(208)	129(209)	132(209)
进出口贸易总额	29	26	15	8	3	3	3
出口额	30	28	14	7	3	3	2
进口额	27	22	17	9	3	3	3
外商直接投资		60	12	9	3	4	6
外汇储备	38	37	7	2	2	1	1
人文发展指数①			79(160)	96(173)	81(177)		

注：①括号中所列为排序资料的国家和地区数。②1977年数。

（二）市场化程度相差无几

在欧洲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西欧各国的市场经济尽管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本质上和原则上是基本相同的，即是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经济调节方式，表现在：市场调节起主导作用，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市场经济法制化。东亚各国尽管经济发展不太平衡，市场化水平不如西欧，但主要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相近，相差无几。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东亚主要国家间不存在很大的障碍，大力发展以市场调节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成为可能。

（三）经济互补性强、依存度不断加深

东亚各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特别是各国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使东亚各国经济存在很大的互补性，东亚既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也有新兴工业国家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这些新兴工业国家工业发展早，第二三产业发展充分，产业结构比较合理，曾经创造过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国与东亚各国贸易往来的加强，中国已在事实上推动着东亚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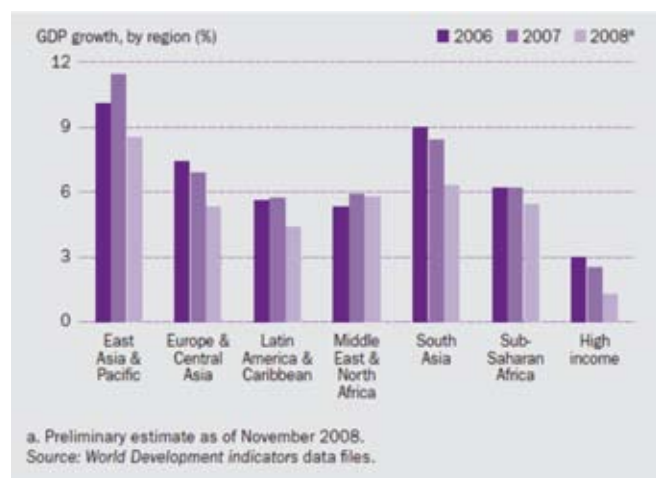
态势使东亚各国经济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原材料，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经验，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局面。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对区域外经济过度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得到改变。其主要表现是相互间贸易依赖日益增强，区域内贸易已占贸易总额的一半左右，并有发展的趋势，这使东亚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不断增强，并采取实质性措施参与东亚人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

（一）东亚经济的发展要求各国之间加强经济合作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首先取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70年代以来，东亚“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经济出现腾飞；80年代起，东盟整体经济迅速发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更是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发展势头。东亚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遭到重创，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也放慢了，但仍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上佳表现。总体看来，二战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东亚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东亚经济发展堪称奇迹。



注：本图摘自世界银行报告“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近几十年来东亚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得益于二战后特定的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环境。美欧为了遏制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遗余力地开放自己的市场，向东亚地区转移资金和技术，扶持其经济发展，增强其经济实力，为东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现在，东亚的历史机遇和外部环境已经改变，美欧已把东亚地区当作自己经济领域的竞争对手，东亚各国只有靠自身努力和相互合作才能保持其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国际经济竞争由国家间竞争转向区域间竞争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竞争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国家为基础进行的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演变为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为基础的竞争，欧美之间的竞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欧盟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并且是目前发展最成熟，具有明显超国家色彩的一体化组织。欧盟各成员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商品、资本、人员和劳务的自由流通和单一货币的使用，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经济事务。

在欧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美国同样希望通过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获得在多边贸易谈判中难以得到的利益，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大市场，形成、保持或强化对欧盟、东亚经济的竞争优势。北美自由贸

易区突破了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建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垂直分工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既有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如美国），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区内成员国的综合国力和市场成熟程度差距很大，经济上的互补性较强。各成员国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同时，通过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推动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区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减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美国积极倡导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实际上只是美国战略构想的一个前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整个美洲建立自由贸易区。美国试图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来主导整个美洲，一来为美国提供巨大的潜在市场，促进其经济的持续增长；二来为美国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势力，与欧洲争夺世界的主导权。

在东亚区域内，目前真正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只有东盟，但是其范围有限，实力较弱，还有待进一步发展，难以代表整个东亚。显然，在国际间竞争日益由国家间竞争转变为区域间竞争的背景下，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欧美相比，已经处于明显滞后的地位。

三、东亚经济一体化阻力重重

（一）东亚是国家性民族主义较强烈的地区

东亚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体制及经济模式，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历史时代的要求相互交融，形成了各异的民族主义。东亚民族主义对东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东亚的现代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民族主义也将给各国发展以信心与推动。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东亚民族主义对地区合作产生的负面影响。东亚的民族主义包涵强烈的民族意识，非常看重国家主权，过于强调本民族国家利益的追求与实现，强调自我利益的满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开展。从整体上来看，民族主义使东亚难以形成一个对各国都有利的利益中心，各国利益重心比较分散。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各国不仅仅注意到自身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其他国家或区域的整体利益，这就要求东亚地区具有合作观念的认同。在民族主义仍较强烈的东亚地区，要各国做出一些走向利益共同体的让步与妥协绝非易事。此外，东亚合作要向纵深发展必然会涉及部分主权的让

渡，由于大多数东亚国家非常看重主权，因此目前很难在主权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各国都希望能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得好处，但又不愿意为加强区域合作做出牺牲。

（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大部分国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个人主义的指导原则；中国、越南、老挝走社会主义道路，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尽管冷战结束后，各国将主要精力转向了经济领域，经济利益优先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已成为趋势，但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非一致性决定了人们对现存经济社会制度合理性、合法性、发展方向及现存社会价值观的不同认识，进而决定了人们对参与东亚经济合作的长远思想和根本思想的不同。各成员国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合作目标不一致，使得各国仍可基于国家安全，社会道德和文化保护为由，以关税或非关税措施继续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出口，阻碍自由贸易的进展。

（三）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四个不同



的发展层次：最上面一层是日本，它属于世界上总产值及人均产值量最高的国家之列；第二层是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最有名的是“四小龙”；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紧随其后，属第三层次；最后的是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属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确定的特别贫困的国家。如表2、表3所示。

表2：东亚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单位：亿美元

国家	1990	2000	2004	2005	2006	2007
日本	30183	46674	46059	45491	43684	43767
韩国	2638	5117	6805	7914	8882	9698
中国	3546	11985	19316	22439	26579	32801
蒙古	21	11	18	23	32	39
新加坡	368	927	1092	1198	1366	1613
马来西亚	440	903	1247	1372	1561	1807
菲律宾	443	759	869	987	1176	1441
印度尼西亚	1144	1650	2568	2870	3645	4328
越南	65	312	454	531	610	712
老挝	9	17	25	29	34	40
柬埔寨	11	37	53	63	73	86
泰国	853	1227	1613	1764	2067	2458

表3：东亚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单位：美元

国家	1990	2000	2004	2005	2006	2007
日本	26660	34620	36690	38930	38630	37670
韩国	6000	9800	14030	15880	17730	19690
中国	320	930	1500	1740	2010	2360
蒙古	1230	410	690	810	1000	1290
新加坡	11860	22970	25290	26860	29090	32470
马来西亚	2390	3390	4560	5080	5690	6540
菲律宾	740	1050	1180	1270	1390	1620
印度尼西亚	620	590	1110	1250	1420	1650
越南	130	390	540	620	700	790
老挝	200	290	420	450	500	580
柬埔寨	——	280	380	440	490	540
泰国	1550	2010	2470	2700	2990	3400

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国民经济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老挝、缅甸国民经济仍然以农业、林业为主。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各国对市场开放的承受力不同，在关税和产业保护方面的政策趋向不同，各国在追求经济开放、经济合作上有很大分歧。发达国家想尽快打开不发达国家的大门，把自己的过剩产品和技术向不发达国家推广；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想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不希望贸易自由化速度太快，希望多一点保护措施，以发展民族工业。东亚各成员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开放市场的程度和步伐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影响了区域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

（四）美国因素的影响

冷战以后，美国的东亚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在“经济安全第一”的口号指引下，美国视东亚为根本利益之所在，东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的亚太经济战略是以亚太经合组织为舞台，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范本，加快推进亚太地区经济贸易的自由化和一体化，最终获得对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主导权。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美国一直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动向保持高度关注与警惕，坚决反对与阻挠

建立任何把美国排斥在外的东亚区域经济集团。事实证明，美国这种战略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1993年12月，当东盟要求日本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时，日本政府迟迟未予明确表态，政府官员也避免做出相关承诺。1994年7月，日本外长和野泽平在会见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外长时说，“日本无意反对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但日本希望看到的是建立一个东盟和美国都能接受的组织”。这充分说明了日本对美国干涉因素的担心。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强化东亚地区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等方面对美国固有的依赖。广泛、长期而又深刻的对美依赖不仅削弱了东亚地区之间的内部经济联系，不利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而且使东亚各国屈服于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加强了美国对东亚各国内部事务及地区事务的影响。多年以来，美国的反对与阻挠一直是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阻碍东亚区域合作顺利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既然美国的亚太经济战略是要主导亚太经济发展，掌握亚太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而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很可能冲击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发展战略，所以美国需要的是不排斥美国的东亚经济合作，并且由美国掌握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美国如果失去这种主导权，它就会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制造障碍与阻力。事实上，美国对一个有凝聚力的亚洲贸易集团没有兴

趣,分而治之才是真正重要的。美国试图将“美国因素”加入东亚一体化进程,从而使东亚的一体化实际上将美国的利益和影响融入其中。由于已经存在一个涵盖美国 and 大多数东亚国家范围的亚太经合组织,因此,美国实际上正在利用亚太经合组织的现成框架来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美国的基本策略是将未来的东亚经济体纳入亚太经合组织的框架之内,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内部化”。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次出访即奔赴远东,巡访日本、印尼、韩国、中国四国,正是这一战略的体现。

四、金融危机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催化剂

(一)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启动了东亚经济一体化

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但是,曾经创造过东亚经济奇迹的“东亚模式”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得不引起东亚各国的反思。旧的“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发展中国家追随其后,形成以日本为主导的“雁形”结构模式,但这种模式也有许多制度上的缺陷,包括预防风险机制等,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就明显地暴露出这种预防风险机制的缺失。亚洲金融危机中,东亚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打击,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经济受到重大创伤。

危机的教训对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提高了东亚各国加强经济一体化合作必要性的认识。东亚国家普遍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信赖性不断提高,同时经济风险也随之日益国际化的新形势下,要提高各国抵御和化解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必须首先加强各国间经济一体化的合作,特别是东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较低,更需要通过地区国家间的一体化合作,壮大经济规模,增强经济实力,以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在危机中东亚各国提高了对地区经济稳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以往各国都是从自身发展看待地区的合作,危机使各国转换了认识问题的角度,更注重从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保证自身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性,因而东亚各国重新审视21世纪东亚经济合作发展的前景,并不失时机地正式开启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大门。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才使东亚各国猛然醒悟:只有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共同防范风险和冲

击的体系,才能更好地保持本国和整个东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它促使东亚各国重新思考,把加强东亚经济合作、启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设想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 2008年金融海啸再一次对进程缓慢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出警示

但由于前面所述各方面原因,东亚经济一体化道路并不顺利,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对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影响,也给东亚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再一次向东亚各国发出警示:必须加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加快一体化进程,才能降低对美国 and 美元的依赖,从而从根本上抵御类似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次贷危机对东亚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可以从FDI和国际贸易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美国一直是东亚国家FDI最大来源国。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的企业特别是金融业亏损严重,美国投资者融资能力和投资能力被大为削弱,投资者许多投资计划由于流动性约束而被迫搁浅,因此,资金的倒流则成为次贷危机的一个必然后果。东亚经济发展对外资流入依赖性较强,而美国一直是其FDI的主要来源地,一旦美资大量撤出,直接后果是东亚的投资规模降低,间接后果是造成本币贬值,资本市场缩水,由此带来本地居民财富缩水,企业融资困难,其经济发展难免受到严重的影响。

其次,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东亚经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将会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这将导致其他国家出口减缓,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GDP增长。次贷危机通过三种方式给国际贸易带来冲击:一是减少了总需求,次贷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的增长放缓限制了世界贸易总需求扩张;二是加大了汇率风险,这次次贷危机给美元币值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全球各类双边汇率波动性显著增强,这给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困难;三是激发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美欧保守势力维护内部需求稳定、打击外部竞争对手的欲望不断强化,贸易壁垒的增强进一步制约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对过分依赖出口,尤其是对依赖来自美国的需求的东亚国家的影响尤为显著。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受次贷危机影响的2008年美国进出口总额将下降10%,受此影响,新加坡的GDP将下降0.9个百分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将下降0.8个百分点,泰国将下降0.6个百分点,印尼将下降0.2个百分点,越南将下降0.1个百分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东亚与美国存在不对称的相互

依赖,东亚在贸易(主要是出口市场)和投资(主要是资金来源)两大方面都对美国存在严重依赖,与此同时,东亚对于美国的意义要次要得多。由此推出,在东亚与美国经济关系中,东亚更多处于弱势地位,而美国则处于优势地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双方经济交往中的被动和主动的关系,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东亚就难以幸免。

加强区域货币合作是应对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美国资产泡沫冲击的长久之计。要解决类似次贷危机的美国资产泡沫对东亚经济的冲击,关键是要削弱美元的本位地位,而区域内加强货币合作无疑是削弱美元本位地位的最有力手段。东亚经济体作为全球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区域,日本和中国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假如能加强区域间货币合作,必然能大大削弱美元的本位地位,降低本国经济对美国和美元的依赖,这才能从根本上应对类似次贷危机的美国资产泡沫所带来的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货币合作步伐大大加快,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东南亚区域正在建立起一个分享和合作的机制,尤其是清迈协议(ChiangMai Initiative),各个经济体协调各国金融政策,可以减轻甚至避免此类危机带来剧烈的震荡。

扩大区域内市场需求,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影响的关键。为了避免经济不断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东亚国家必须大力启动内需市场,注重对自己市场的开发和培育,强劲的内需以及区域内贸易上升将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增速可能放缓的影响。同时,内需的增长主要依赖发达的服务业,创造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业是东亚国家摆脱经济困境的关键,它一方面能够在出口受挫时,通过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摆脱区域内就业与出口经济直接联系的风险,从而有效地保证地区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增加收入可以直接扩大有效需求。

(三) 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此次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受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同美国经济和金融联系最密切的其他发达国家。即使西方国家能够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由于信贷紧缩如此严重,经济衰退几乎难以避免。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GDP下降了6.3%,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了6.4%,为近30年来的最大降幅。根据2009年8月2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二次估算报告,第二季度GDP年化数字下滑了1%,好于市场预期,跌幅远低于第一季度的跌幅6.4%,表明第二季度的经济衰退状况已经减缓,但仍表明,美国经济已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首次出现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对比去年第二季度,今年第二季度美国GDP仍萎缩了3.9%。新兴经济体的地位

和作用近年来得到提升。2003年10月美国高盛投资银行最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指的是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这几个经济发展迅速、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新兴国家。2007年,这家银行又提出“钻石十一国”,包括菲律宾、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越南。日本“金砖四国”经济研究所则提出“远景五国”,即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都是指继“金砖四国”之后,有望蓬勃发展的国家。站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视角,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出现停滞或下滑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和东亚各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市场的份额肯定会加速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会有所增强,极大地冲击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原有世界经济格局,因此,东亚各国理应加强合作,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

五、中国应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为推动我国进一步扩大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我们必须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更加积极地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以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增长空间,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好地利用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在东亚地区拥有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基本利益,随着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中国正成为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中国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变得愈来愈重要,因此,中国的参与对东亚合作的发展来说举足轻重。中国应在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同时,也为东亚及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 中国在东亚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紧随其后、东盟和中国为雁尾的垂直型产业分工体系——雁行模式。日本是东亚资金、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供应者,又是能源、原材料、消费品的大市场;四小龙是生产设备、中间设备和零部件的供应者,也是能源、原材料的重要消费者;东盟和中国是能源、原材料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重要供应者。进入90年

代,东亚各国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东亚的垂直型产业分工格局逐步被垂直型产业分工体系和水平型分工体系并存的格局所取代。中国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在努力提高技术含量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东亚的产业链上,中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基地,吸纳了来自东亚各国的资金和技术,和东亚其它国家进行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合作,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东亚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中国生产的产品不仅出口到东亚其它国家,而且出口到全世界,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中国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和投资合作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中国在东亚产业分工合

作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可以预见,随着东亚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二) 中国在东亚区域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在中国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经济发展也使中国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成为东亚重要的市场提供者,中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额不断扩大。近30年来,东亚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都有数倍的增长,其速度大大超过其他经济体之间出口依存度的增速,表明中国在区域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东亚和东南亚出口巨幅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中国进口需求的快速增长。中国在东亚贸易格局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市场提供者,对东亚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表4: 中国对亚洲国家(地区)贸易统计

资料来源: 商务部

单位: 亿美元

时间	日本		韩国		朝鲜		蒙古		东盟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2002年	484.37	534.68	154.97	285.74	4.68	2.71	1.4	2.23	253.69	311.98
2003年1-10月	476.75	601.81	156.89	345.68	4.93	2.31	1.3	2.28	245.53	380.51
2004年	735.14	943.72	278.18	622.50	8.00	5.86	2.33	4.60	429.02	629.78
2005年	839.92	1004.52	351.09	768.22	10.81	4.99	3.19	5.41	553.71	749.99
2006年	916.39	1157.17	445.26	897.79	12.32	4.68	4.34	11.47	713.14	895.26
2007年	1020.71	1339.51	561.41	1037.57	13.93	5.83	6.83	13.47	941.39	1082.69
2008年	1161.34	1506.51	739.51	1121.62	20.32	7.6	9.06	15.31	1141.42	1169.74
2009年1-7月	522.63	676.41	281.66	530.90	8.97	4.51	4.56	5.95	536.36	537.90

(三) 中国在东亚区域金融合作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中国在东亚产业格局和贸易格局中地位的提高,使其有条件成为东亚金融合作的重要力量。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中国政府从维护东亚地区经济稳定的大局出发,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缓解了东盟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所承受的压力,对稳定东亚地区的货币汇率做出了贡献,对东盟国家在世界经济整体波动的情况下平稳地走向恢复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中国这种维护地区经济稳定和发展大局的大国风范,得到了东盟各国的赞扬与肯定,赢得了它们的信任,同时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进一步密切经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良

好,人民币币值稳定,因而在一些东盟国家已取得了硬通货的地位,在这些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合法流通并在与东盟成员国的边境贸易中充当了主要结算货币。2009年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内四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结合此前中国央行与韩国、马来西亚等6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的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可以预见的是,在东亚地区的人民币结算量将继续增加,人民币将在东亚金融领域继续发挥“金融稳定器”的作用,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

(四) 金融危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地位

中国是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发展势头良好,不

仅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且潜力巨大，尽管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中国经济仍有良好表现，正如世界银行在2009年6月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所说，“中国经济保持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中国今年和明年仍将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在日本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2009年8月15日，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商务部陈德铭部长与东盟10国的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该协议的签署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国和东盟各国愿同舟共济，携手抗击金融危机，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复苏与经济一体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是，中国经济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技术创

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有多强，中国与周边国家能否和平相处，中国的发展能否继续为周边国家带来机遇，这些都成为中国能否继续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中国只有不断努力发展经济，保持国内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坚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东亚地区争端，协调与区域内各国的关系，才能在东亚合作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做到与东亚各国真正的互利双赢。

总之，中国应以积极和建设性姿态参与东亚事务，这将促进亚洲各国政治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将得到新的提升，中国作为东亚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进一步确立，从而为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与资料：

- 1 范洪颖：《东亚大趋势》，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 2 李玉举：《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年2月。
- 3 张鸿：《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东亚经济合作》，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 4 梁碧波：《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学术论坛》，2008年第6期。
- 5 曹玉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与进程缓慢原因分析》，《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1期。
- 6 孙文善：《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措施研究》，《经济师》，2008年第12期。
- 7 [美]吴一群、刘榆：《刍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启示》[J]，《东南学术》，2009年第1期。
- 8 王洛林、李向阳：《世界经黄皮书（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9 邵峰：《金融危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
- 10 商务部：“中国与亚洲国家贸易统计”历年统计数据。
- 11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数据（2008）”。
- 12 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
- 13 World Bank, “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14 World Bank Database.
- 15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IRST QUARTER 2009 (ADVANCE)”, <http://www.commerce.gov>.
- 16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Second QUARTER 2009 (SECOND ESTIMATE)”, <http://www.commerce.gov>.

傅吾康对东南亚华文碑铭资料之搜集与研究¹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李雪涛

【摘要】本文通过对德国学者傅吾康的生平和研究思路的剖析，他对东南亚华文铭刻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傅吾康的这些工作，对东南亚海外华人研究在史学、社会学、民俗和宗教学乃至语言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强调了傅吾康晚年的研究与他以往明清史研究的关联性。本文作者认为，在东南亚华文碑铭的搜集与研究方面，傅吾康不论在史料的拓展方面，还是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范式。

【关键词】傅吾康 东南亚 华文碑铭 汉学

一、傅吾康学术生平述略

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 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明清史研究的权威学者。生于1912年的傅吾康，其父福兰阁 (Otto Franke, 1862-1946) 在当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并于1909年在汉堡创立了德国首个汉学教席。傅吾康于1935年在中国哲学史专家佛尔克 (Alfred Forke, 1867-1944) 教授门下做了题为《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的博士论文，²这篇论述中国保守派与西方改良主义思想论争的专著，后来也奠定了傅氏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1937年傅吾康只身到了中国，辗转上海、南京等地后到达了北平。他曾参与了“中德学会” (Das Deutschland-Institut) 的组织、领导工作，先后在学会中担任秘书、总干事以及《中德学志》编辑部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经萧公权 (1897-1981) 先生的推荐，傅吾康谋得了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教授的位子，讲授“明史”和“德国历

史”等课程。1948年他又接受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冯至 (1905-1993) 教授的邀请，出任北大的德语教授。1949年6月傅吾康得到了汉堡大学的正式任命书，他于1950年回到汉堡，接替了自颜复礼 (Fritz Jäger, 1886-1957) 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一直到他1977年退休。

1963-1966年期间，傅吾康利用大学和政府给他的三年学术假期，接受了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恢复了多年来没能够成立的中文系。他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多地培养华文人才。

1977年退休后，傅吾康从1978-1983年间重新任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并全身心地投入了东南亚华人史，特别是铭刻文献的搜集工作。傅氏曾深入东、西马来亚、汶莱、印尼和泰国境内之城乡僻壤，走访各地的华人寺庙、祠堂、会馆和义山坟地，许多几乎遭受湮没命运的东南亚华人事迹和碑铭资料，因他的发掘或抢救而得以重见天日。他曾与东南亚当地学者合编有《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 (三册，1982、19845、1987，共1510页)、《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 (四册，1988-1997，共1869页)、《泰国华文铭刻汇编》 (一册，786多页)，为研究早期新、马华人史的学者提供了扎实、可靠的新史料，为重建东南亚华人史之编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早年的研究兴趣

早在1946年傅吾康就谋得了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

1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2008年度资助项目。本文作者李雪涛，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中心副主任、《国际汉学》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汉学、德国哲学和中国佛教史。

2 Wolfgang Franke, „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 und seiner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 Chinas mit dem Abendland“, i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38(1935), S. 1-83 (Dissertation).

教授的位子。在成都，经萧公权的介绍，傅吾康认识了在这两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的闻宥（1901-1985），闻氏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研究所（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的所长。傅吾康很快便跟闻宥成为了朋友，并且也在研究所任职。闻宥本人非常重视西方和日本汉学家所取得的成就，这也是在他的研究所为什么收藏有欧洲汉学专业杂志——整部《通报》（T'oung Pao）的缘故。研究所由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Institute）资助，并且出版西文的刊物《汉学研究》（Studia Serica）。该研究所也同其他逃亡到成都的教会大学共同出版以中文为主的期刊《中国文化汇刊》（Chung-guo wen-hua hui-k' an,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傅吾康主要是协助编辑部的工作，并且为这两份刊物撰写学术论文，这当然也是他的兴趣所在。

成都也为傅吾康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闻宥教授向他介绍了那里特有的汉代墓葬文化。1948年春天，傅吾康利用研究所给他提供的机会，在乐山待了五个礼拜的时间，实地考察了嘉定府所遗留下来的无数的汉代岩墓。随他同去的还有两位工匠，他们拓下了50多种浮雕纹饰图案，南京金陵大学的杨枝高博士则向他指明了墓葬的确切位置。这次考察，对傅吾康来讲可谓是硕果累累，不久他便完成了两篇有关汉代墓葬的论文。³在四川所作的金石学之田野考察，也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在东南亚大规模采集华文金石铭刻文献打下了基础。

三、铭刻研究的缘起

早在1960年的时候，傅吾康便开始了寻访明末以来越来越多在东南亚各地生根的东南亚华人的史料。1963-1966年期间，傅氏利用大学和政府给他的三年学术假期，接受了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在恢复多年来没有建成的大学中文系之外，他的研究兴趣慢慢由华文教育转向了东南亚华人以及中文正史对东南亚的记载方面。⁴其后于1969至1970年，傅吾康又被新加坡南洋

大学历史系和中文系联合聘请为客座教授。由于华人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至今在东南亚地区还保留着大量珍贵的华文铭刻。这些铭刻对印证和补充正史的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傅吾康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后，为了能使这些遭受自然和人为破坏的史料以文字的形式得到确实的保存，1971年他申请到了德国研究联合会（DFG –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的基金，展开了为期四年的题为“东南亚华人金石木陶铭文集”的史料搜集和出版工作。1972年的时候，他已经发表了第一篇有关东南亚铭刻的研究专论：“西马及邻近地区的中文碑铭”⁵。

在其后的20多年的日子里，傅吾康多年如一日地在星马、印尼和泰国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常常出入人迹罕至的丛草墓地中，去搜集、拓印、复制各种铭刻。其后的整理、编选以及撰写说明等学术工作，他也一丝不苟地跟合作者共同完成了。

四、在傅吾康以前学界已有的成就

（一）国内、国际之东南亚研究

中国有关华侨华人的研究历史并不长，如果从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算起，⁶至今不过百余年的时间。民国时期，出版了一批重要的东南亚研究的专著，暨南大学还成立了“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主办《南洋研究》杂志，编辑“南洋丛书”40余种。上世纪50-70年代，国内的东南亚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这一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港台等地区，当时依然延续民国时期的名称——“南洋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者开始关注华侨华人（以东南亚华侨华人为主，兼顾到世界其他各地）的学科发展，目前国内重要的大学纷纷设立“华侨研究中心”等机构。1988年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主办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创刊，这是一本专门研究华侨华人历史和现状的学术性刊物。教育部人文社科

3 W. Franke, „Die Han-Zeitlichen Felsengraber bei Chia-ting (West-Ssuehuan)“, in: *Studia Serica VII (1948)*, S. 19–39; Dere, „Gräber aus dem 2. Jahrhundert n. Chr. in Ssu-ch'uan“, in: *Sinologica 2/4 (1950)*, S. 294–298.

4 W. Franke, „Some Remark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on Southeast Asia, with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of the Ming Period, 1368–1644“, in: *Southeast Asian Archives (Kuala Lumpur)*, Vol. 2, July 1969, S. 11–20. W. Franke, *Ming Shih-lu chung chih Tung-nan Ya shih-liao, 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 Reign Chronicles (1368–1644)*, Vol. 1, OE 17. Jg. (1970), S. 248–252.

5 W. Franke, „Chinese Epigraphy in West-Malaysia and Adjacent Areas. A Preliminary Report“, *Journal of Asian Art*, Inaugural Issue, Lee Kong Chian Museum of Asian Culture,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1972, S. 161–172.

6 梁启超《中国伟人传五种·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第55–60页。

在2002-03年度还将“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作为重点课题，可见这一学科的建设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⁷

由于海外殖民的原因，西方的东南亚研究是随着其殖民扩张而展开的。早期的汉学家，如法国的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英国传教士中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荷兰莱顿汉学家施莱格尔(或译作：薛力赫，Gustave Schlegel, 1840-1930)等都有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著作或论文，他们大都认为，对东南亚华人史地的研究是汉学的域外延续。英国皇家历史学会(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于1878年在新加坡成立了分会，当时名为海峡分会，直到1923年才改为马来亚分会，编辑出版有大量西方有关马新研究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东南亚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荷兰、美国等几个国家。在有关欧洲学者在东南亚华人研究，傅吾康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欧洲学者在中国和东南亚关系以及东南亚海外华人研究方面的贡献〉中予以了梳理。⁸

(二) 东南亚华文铭刻的搜集与研究

在傅吾康之前，有关东南亚华文碑铭的研究只是小范围地展开过，甚至这些重要的一手文献从来就没有系统地整理过。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才开始出现个别的中文、日文以及西文的研究著作。1969年饶宗颐发表了《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⁹，尝试着将这一地区的铭刻作全面的研究。陈荆和与陈育崧于1968/69年曾设计搜集星马华人碑文的计划，但由于马来西亚1969年华人与马来人之间冲突严重的“5·13事件”之爆发，不得

不将其工作范围限定在新加坡。这些被整理出来的资料包括119件石碑的铭刻，后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¹⁰但距离完整的文献整理依然相距甚远。

日本学者也在上世纪60年代在日比野丈夫(Hibino Takeo, 1914-)的带领下，开始在马六甲开始了华人庙宇以及墓碑铭文的搜集工作。尽管日本学者尚未出版系统性的资料汇编，但其他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引用铭文资料，如今堀诚二(Imahori Seiji)的著作《马来亚华人社会》中，¹¹就曾大量地引用了铭文资料。¹²

五、铭刻的种类和主要形式

我们通常认为，铭刻主要是以刻石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傅吾康通过对东南亚铭刻的搜集和整理，对当地铭刻的种类和主要形式作了如下的归类，其种类之丰富超过了一般的想象：

石碑、木牌或木板，特别作铭刻之用。

经过铭刻的天然石头和城垣。

铜版或铜牌，特别作铭刻之用。

墓碑，多为石制，有时也为木制，尤其多见于东马和印尼。

木制匾额，后来有的演变为以水泥为材料。

木制对联，近来也常刻在石柱或水泥柱上。

纪念碑、塔。

铜钟或铁钟。

云版，由铜或铁铸制成的打击乐器，用于寺庙中，其作用与铜钟相仿。

各式各样的香炉(由石头、铁、黄铜、木头等制成)。

石狮子，置于正式建筑、寺庙和墓地的前面。

旗杆基石，有时也为木制。

7 以上请参考：廖文辉〈史料、方法、理论——谈马新中文源流“华人研究”主题建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3月)，第23—31页；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1期，第51—59页。

8 W. Franke, „European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at Area“, in: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Han-Shan Tang Books.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London 1995, pp. 438—466.

9 原载：《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学报》，1969年第10期，第1—51页。

10 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

11 今堀诚二《马来亚华人社会》(中译本)，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年。

12 傅吾康著，黄静译：〈现阶段东南亚华文铭刻资料的搜集与编纂〉，收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6—27页。原文见：„The Present State of Collection of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Southeast Asia“, in: *Asian Culture 16*: Singapore, June 1992, pp. 46—55.

仪仗牌，通常为木制。

神案和神龛。

栋。

神主或牌位。

神位，大多为木制，有时也为石制。¹³

除了以上的各种媒质之外，傅吾康还在一些仪式用的器物上发现了铭刻：如仙鹤，仪式用长矛、占卜用竹筒、烧纸钱的火炉和神轿等。¹⁴

六、资料搜寻及研究工作所面临的困难

傅吾康认为，在东南亚进行铭刻搜集的最佳时机应当是在二次大战之前，由于大量此类的重要史料是置于露天的石质、或庙宇之中的木质铭刻，很容易毁于战火。因此，战争毁坏了很多重要的铭刻。另外一些重要的铭刻资料又在其后的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遭到人为的破坏，如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此外，也由于某些政治上的原因——如排华等政治事件，也使得很多华文铭刻遭到了破坏。以上所涉及的大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由于大量这类的铭刻暴露在室外，饱受自然的侵蚀和污染，也使得很多铭文漫漶。¹⁵此外，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同时也处在急剧变迁的时期，各类历史古迹都可能遭到不同程度的人为或自然的破坏。

存放在华人聚居区的铭刻资料比较容易获得，但墓碑较为分散，或被挪作他用（作石阶等），如果想要搜集全很不容易。¹⁶

在研究方面，东南亚华人在铭刻中所使用的一些特殊方式显然受到了诸如泰语、马来语或众多印尼语中之一的影响，以及英语或荷兰语等殖民者语言的影响。因此有时想要鉴定用汉字翻译的译名，往往是很困难的事情。福兰阁曾深刻地指出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仅是

因为中文文字所具有的表意特征妨碍了准确地音译外语发音，而且中国人在对待外来事物时所惯有的那种源于傲慢的不经心，如同过去的中国文人所表现的那样，使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这种不准确性，而且容许每个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言发音来翻译外语词汇。¹⁷

七、傅吾康在东南亚铭刻资料整理方面的贡献

（一）研究的理路及特殊贡献

作为历史学家，傅吾康一贯重视史料的运用，并将中文文献与西文资料并重，他的《明代史籍会考》就是在这方面最好的例证。¹⁸在方法运用方面，他总是力图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欧洲学界尽可能多地理解远东的文明。在《中国与西方》一书中，傅氏便称：“跟中国人的西方观相比较在书中我更深入探讨的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因此这本小册子署为《中国与西方》而不是反过来的《西方与中国》。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读者理解中国的立场以及面对西方时的中国态度。”¹⁹此外，在历史的梳理方面，傅氏从其父福兰阁那里继承了中国历史乃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运动和观念，他总是到中国历史中去寻找根据。在《中国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订版）一书中，²⁰傅氏便强调要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去看中国革命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他从《易经》里“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为轻”的思想出发，证明了“革命”并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现的西方观念，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²¹

和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这样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3 见前揭傅吾康文《现阶段东南亚华文铭刻资料的搜集与编纂》，第24页。

14 出处同上，第24页。

15 出处同上，第23页。

16 出处同上，第23—24页。

17 出处同上，第26页。

18 W. Frank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Kuala Lumpur & Singapore, 1968.

19 W. Franke, *China und das Abendland*, Göttingen 1962, S. 3.

20 *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851–1949*, 2. verb. u. erw. Aufl., München 1980.

21 亦请参考傅吾康1956年的一篇演讲稿：Di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von 1851 bis 1948) “(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1851–1948])”，in: *Dialog*, Düsseldorf 1956, S. 53–66.

1880-1966) 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他认为, 海尼士所认为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观点, 尽管在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 但却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传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的观点, 亦即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²²傅氏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 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傅吾康将这样的—个汉学学术传统也运用到了东南亚华文铭刻的研究上来。他认为, “铭刻资料是研究华人移民史以及华人在东南亚活动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²³“这批华文铭刻资料之所以日益受重视, 主要乃因人们发觉到此类内容涉及海外华人历史与社会发展之原始资料, 对解决本区域一般历史存疑之处甚有助益有以致之。”²⁴因此, 在傅吾康看来, 在东南亚发现的华文碑铭, 绝非一些枯燥的历史文物, 而是与东南亚华人当今的一切都有千丝万缕关联的活文献。

傅吾康除了在正史和地方志等传统文献中验证铭刻中出现的人名、官职、地名之外, 更注重东南亚华人社团之信仰与历史的关联, 他的〈从铭刻之证据看苏门答腊北部华人村落〉²⁵、〈在东南亚的中国宗教〉²⁶以及〈作为东南亚华人研究之源泉的铭刻资料和“灰色文献”〉²⁷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研究的典范。

作为一位敏感的历史学家, 傅吾康发现“石碑、木牌及铜牌上的具体铭文往往能提供某些至关重要的历史情况。”²⁸“然而, 许多铭文的确提供了关于不同华人社区、当地历史、宗教仪式以及其他方面的宝贵资料。有

时, 某一机构与中国的联系显而易见。记载了墓地、庙宇或任何其他机构的规章制度的铭文值得特别的关注。尤其当我们从其它途径无法获得它们的时候。”²⁹正是依据这种方式, 傅吾康为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寻找到了很多弥为珍贵的史料。

这批东南亚华文铭刻中在时间上最早的, 应当是傅氏与时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铁凡(1912-1992)于1972年3月在文莱一处回教古坟地中发现—块墓碑。³⁰经考证, 这块碑上所刻的文字为: “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 “景定”为南宋理宗赵昀的年号(1225-1264年在位), 其甲子是公元1264年。傅吾康在考证了中国和文莱(婆罗洲, 古代作: 勃泥或渤泥)两千年的关系后, 指出, 一般学者认为, “文莱统治者与中国统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 至少从十四世纪较晚时期起就已存在。”³¹通过跟大量中国古籍和海外汉学家对中外交通史成就(其中包括西方学者、日本学者以及世界各地之中国学者)的对比研究之后, 傅吾康认为, “他(指蒲公)可能是他们(指蒲亚里和蒲卢歇)之中的—个人的后裔。他们的家属可能如同蒲寿庚的家属—样已中国化, 但仍保持他们的穆斯林信仰, 并已好几代继续从事与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我们可以推测这位蒲公已中国化, 因为他是来自泉州的—个中国官员, 而且他的墓碑完全是中国式的。”³²对于这位蒲公葬在文莱并且拥有如此规模墓地的原因, 傅吾康认为, “(蒲公)必定是—位在地方上很受尊敬的人, 或者是一位派往某—其他地区而死于途中的中国使者, 否则人

22 请参考: W. Franke, *Im Banne China: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50-1998*. Bochum: Projekt-Verlag, 1999. S. 8-9.

23 见前揭傅吾康文〈现阶段东南亚华文铭刻资料的搜集与编纂〉, 第23页。

24 傅吾康著, 苏庆华译: 〈东南亚华文铭刻资料的搜集与出版〉, 收入: 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史学、哲学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年, 第211-219页, 此处引文见第211页。

25 „Chinese Settlement in North Sumatra as seen from Epigraphic Evidence. A Preliminary Report“, i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of North Sumatra*, ed. by Rainer Carle, Berlin/Hamburg 1987, pp. 111-131.

26 „Chinesische Religion in Südostasien“, in: *Südostasien Informationen* 4:2, Bochum, Dez. 1986, S. 6-10 (unter Pseudonym).

27 „Epigraphic Materials and ‘Grey Literature’ as Sources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in Tien-wai (ed.), *Collected Essays on Local History of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Con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S. 473-492. Erschienen 1992.

28 见前揭傅吾康文〈现阶段东南亚华文铭刻资料的搜集与编纂〉, 第24页。

29 出处同上, 第25页。

30 1973年傅吾康和陈铁凡将这一重大发现公之于众, 见: 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 A.D. 1264, 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 A Preliminary Report“, *The Brunei Museum Journal* 3/1 (1973), pp. 91-99 (together with Ch’ en T’ ieh-fan)。温广益的中文译文〈最近在汶莱发现的一块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见: „《泉州文史》(第9期), 1986年, 第150-154页。

31 见上揭温广益译〈最近在汶莱发现的一块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 第152页。

32 出处同上, 第153页。

们是不会为他准备那么大的墓地。”³³这一南宋石碑发现，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为研究古代中国和婆罗洲的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性文献。

在东南亚的华人宗教研究中，傅吾康充分利用了华文铭刻的资料，对三一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梳理。在〈对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表现形式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他使用了包括《公建九鲤碑记》、《九鲤洞甲午第二届逢甲大普度纪今碑》以及寺庙中各类匾额上的铭刻，对星马不同地区的三一教的各种变化的宗教形式进行了研究。³⁴而他的〈东南亚的华人宗教〉一文，³⁵更像是一本《东南亚华人宗教指南》，对重要的佛寺、道观、夫子庙、家祠等都一一作了详细的解说。

（二）铭刻的整理出版

1983/85/87年，傅吾康与陈铁凡将他们10余年来搜集和整理的铭刻资料分三卷予以了出版：《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三卷/*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3 Vols.³⁶，这是迄今为止有关马来亚华文碑铭最为完整的资料汇编，收录有来自东、西马各地约1300项铭刻资料，合计共1510页。每项附上了自原址拍摄的原件照片，以及加上标点的铭刻正文。此外，每一项下也附上了简短的英文提要，介绍铭文的主要内容。三卷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卷收录了吉隆坡、柔佛、吉打、吉兰丹及马六甲五州的华文铭刻；第二卷收录了森美兰、彭亨及檳城三州的铭刻文献；第三卷收录了霹雳、玻璃市、雪兰莪、丁加奴、沙巴及沙撈越六州的华文铭刻资

料。为了方便查找起见，书后附有人名、商号及机构索引。有关此书在学术上的贡献，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苏庆华认为，“此书之出版，不仅为保存史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间接地也带动了研究和撰写更充实、可靠的当地华族史的新潮流”。³⁷

1988年傅吾康与苏尔梦（Claudine Salmon）以及肖国健（Anthony K. C. Siu）共同出版了《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第一卷：苏门答腊）/*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 Vol. I: Sumatra*³⁸，搜集了苏文答腊岛上之亚齐（Acheh）、北苏门答腊、廖内（Riau）、西苏门答腊、占卑（Jambi）、南苏门答腊、明古连（Bengkulu）及楠榜（Lampung）各地的华文铭刻约850件。该卷共575页。第二卷（爪哇岛部分：又分为上、下两册）³⁹收录了爪哇岛上的雅加达（Jakarta）、西爪哇、中爪哇及东爪哇各地的华文铭刻资料，两册共870页。第三卷收录了厘、加里曼丹、南苏拉威西（Sulawesi）以及马鲁姑群岛（Moluccas）等地的华文铭刻资料，共计424页。⁴⁰

1998年傅吾康与刘丽芳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泰国华文铭刻萃编》一书。⁴¹这部厚达786页的资料集是迄今最为完整的搜集了泰国华文铭刻资料专集，包括：大曼谷地区、大城（Ayutthaya）、佛统（Nakhon Pathom）、北榄坡（Nakhon Pathom）、北榄坡（Nakhon Sawan）、武里南（Buriram）、乌汶（Ubon Ratchathani）、昌莱（Chiangrai）、普吉（Phuket）、素叻（Suratthani）、拉廊（Ranong）、陶公

33 出处同上，第154页。

34 „Some Remarks on the ‘Three-in-One Doctrine’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 OE 19 (1972), pp. 121–129. Some Remarks on the ‘Three-in-One Doctrine’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t. II “, in: OE 27 (1980), pp. 6–24.

35 „Chinese Religion in Southeast Asia with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of Medan, North Sumatra “, i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43 (1988), pp. 23–42. 中文译文〈东南亚的华人宗教〉见《世界宗教资料》1989年第2期，第54–57。

36 傅吾康、陈铁凡（together with Chen Tieh Fan）合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三册，1982、1984、1987，共1510页）/*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Vol. I. II. III,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edited, Kuala Lumpur 1983/84/87.

37 苏庆华〈汉学家傅吾康教授对马、印、泰三国华文铭刻文献资料采集之贡献〉，收入：苏庆华主编《庆祝傅吾康教授八秩晋六荣庆学术论文集》（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出版，2000年），第28–37页。此处引文见第33页。

38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 Vol. I, Sumatra,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edited,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88 (together with Claudine Salmon u. Anthony Siu).

39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 Vol. 2, Part 1 u. 2.: Java. Ed. by Claudine Salmon and Anthony K.K. Siu,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Paris, 1997.

40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 Vol. III: Bali, Kalimantan, Sulawesi, Moluccas.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edited,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together with Claudine Salmon u. Anthony Siu).

41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Thailand*.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edited, Shin Wen Feng Print Co., Taipei 1998 (together with Pornpan Juntaronanont).

(Narathiwat)、北大年(Patani)、宋卡(Songkla)、耶拉(Yala)等大小城镇的文献,为中文文献颇为奇缺的泰国提供了珍贵的一手铭刻文献资料。与前两部华文铭刻稍有不同的是,铭刻中除了华文之外,也收入了部分重要的与华文文献有关联的泰文部分。本书由饶宗颐教授作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三) 有关东南亚华文铭刻的研究

傅吾康对东南亚华文铭刻的整理工作的基础是他对这些华文铭刻的研究,也就是说,他的研究工作对资料的整理起着很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难得的华文铭刻资料的整理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展开,无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总体上来说,傅吾康是从中文史料(特别是明史)进入东南亚华文碑铭的研究的,这从他1969-1972年间的三篇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69年:〈对中文史料(特别是明代)东南亚部分的一些看法〉;⁴²1970年:〈《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⁴³1972年:〈对有关东南亚的中文史料的一些看法〉。⁴⁴由于有机会在东南亚进行实地考察,傅吾康对在当地看到的一些华文铭刻也结合中国的正史做了一些研究。

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文碑铭方面,傅吾康在1972年就发表了〈西马及邻近地区的华文铭刻〉的论文,⁴⁵

对这一地区的华文铭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年他与陈凡铁教授在文莱一处回教坟场发现一块年代为1264年的石碑,这一南宋时代的墓碑是迄今所知在东南亚一带被发现的最古老的铭刻。次年以两位学者的名义所发表的〈最近在汶莱发现的一块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一文,在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⁴⁶1977年傅吾康还发表了一篇中文文章〈金石木铭简述及马来西亚华文金石墓铭的搜集及研究纪略〉,再次为几年来历尽辛苦所完成的德国研究联合会的项目作了系统的说明。⁴⁷在有关东南亚华人的历史、现状及其宗教信仰研究方面,傅吾康所使用的史料除了正史和地方志以外,更多使用的是各种各样的铭刻资料,这同时也增加了他研究的可信度。

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傅吾康也一直关注印尼的华文铭刻,因为“现今的印尼群岛是除了那些近邻中国的岛屿之外海外华人最主要的活动地区。”⁴⁸傅吾康也自然地将印尼的华文铭刻纳入了他的资料搜集和研究的范围。早在1974年他就在《南洋学报》上撰文〈印尼的中文铭刻〉,⁴⁹对在印尼的华文铭刻情况作了初步的报道。其后傅吾康又对安汶岛的铭刻情况做了介绍。⁵⁰除了对铭刻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之外,傅吾康更愿意用这些材料来研究华人在当地的历史和现状。1987年他撰写了论文〈从铭刻之证据看苏门答腊北部华人村落〉,⁵¹对印尼苏门答腊北部华人所新拓居的区域进行了研究。

42 „Some Remark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on Southeast Asia, with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of the Ming Period, 1368–1644“, in: *Southeast Asian Archives (Kuala Lumpur)*, Vol. 2, July 1969, pp. 11–20.

43 *Ming Shih—lu chung chih Tung—nan Ya shih—liao*, 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 Reign Chronicles (1368–1644), Vol. 1, OE 17. Jg. (1970), pp. 248–252.

44 „Some Remark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in Southeast—Asia“, in: *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Hsiao Kung—ch'üan*, Hongkong 1972, pp. 155–167.

45 „Chinese Epigraphy in West—Malaysia and Adjacent Areas. A Preliminary Report“, *Journal of Asian Art*, Inaugural Issue, Lee Kong Chian Museum of Asian Culture,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1972, pp. 161–172.

46 „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 A.D. 1264, 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 A Preliminary Report“, *The Brunei Museum Journal* 3/1 (1973), S. 91–99 (together with Ch' en T' ieh—fan). 中文译文〈最近在汶莱发现的一块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收入《泉州文史》(第9期),泉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0–154页。

47 收入:《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1977年,第636–642页。

48 见前揭傅吾康文〈现阶段东南亚华文铭刻资料的搜集与编纂〉,第27页。

49 „Chinese Epigraphy in Indonesia. A Preliminary Report“,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Nan—yang hsüeh—pao)*, Singapore, Dec. 1974, 29: 1/2, pp. 31–45.

50 „Not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t Ambon & Epigraphic Evidence and Present Conditions“, in: *Nanyang yu Zhongguo*, ed. by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87, pp. 203–214. 中文译文〈安汶岛华人社区简记——碑文资料现状〉,见《民族译丛》1988年第6期。

51 „Chinese Settlement in North Sumatra as Seen from Epigraphic Evidence. A Preliminary Report“, i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of North Sumatra*, ed. by Rainer Carle, Berlin/Hamburg 1987, pp. 111–131.

有关泰国铭刻的研究在傅吾康之前很少见到，早在1976年傅吾康就曾发表了“泰国的中文铭刻”的演讲稿，⁵²对几件来自泰国的铭刻进行了介绍。1984年又发表了有关北大年1592年的墓碑铭刻研究论文。⁵³1990年傅氏在昆明召开的“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上发表了〈泰国的华文铭刻资料〉一文，⁵⁴为后来的《泰国华文铭刻萃编》一书的编纂，勾勒出了一个整体的框架。

饶宗颐先生后来在《泰国华文铭刻汇编》的“序”中，在谈及傅吾康教授对华文铭刻的收藏时写道：“忆1970年在星洲，余首倡缀录星、马地区华人碑刻，以备考史之资，傅吾康教授颇韪之。继起有作，既网罗马来西亚所有华文碑碣，复遍及印尼、泰京，孜孜矻矻，殚心力于此事，锲而不懈，历二十余载，集东南亚华碑研究之大成……。”⁵⁵这是对傅吾康为保存华文史料而苦心孤诣的忠实写照。

八 结论

在关注东南亚铭刻研究之前，傅吾康在汉学方面的兴趣主要是明清史的研究，他清楚地认识到，明代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已有的版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由于战乱和其他原因逃亡到海外，其中在东南亚各地安家落户的华人数量尤其多。这些华人尽管生活在地理环境和文化相异的地区，但在很多方面依然保留着汉字文化的各方面特征，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华文碑铭。对于研究者来讲，傅吾康所发掘和出版的这些在当地出现的新史料，相对于源自中国传统的古典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可视为更直接的本土史料。对这些华文碑名的搜集与整理，对华文史料本来就非常缺乏的东南亚华人社会来讲，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对东南亚海外华人研究在史学、社会学、民俗和宗教学乃至语言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的学者有的甚至认为傅吾康所发掘的碑铭等文献史料跟中国传统的文献相比，应当称作为“新史料”。⁵⁶在研究方法方面，傅吾康除了使用传统的对史料搜集、整理、归纳和论证的分析方法外，也格外注意引入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的各种社会学方法。

同时作为一位具有良知的德国知识分子，傅吾康对东南亚华人在日据时期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在1988年同陈铁凡教授共同编纂了《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⁵⁷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责任感，揭露了这段历史的真相，伸张了人类的正义。

陈寅恪先生当年在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的“序”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家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⁵⁸依据陈寅恪的观点，对新材料的拥有以及独特的问题意识是在研究上能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前提。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法国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传统（特别是年鉴派）尝试着通过“问题史学”来取代以往的“叙事史学”，进而强调运用社会学各种方法的分析性而淡化叙述性。新史学同时发掘了一系列新的史料，如财政档案、身份证明记录、壁画、雕塑、日记、铭文等，大大开拓了以往史料使用的范围。在东南亚华文碑铭的搜集与研究方面，德国学者傅吾康不论在史料的拓展方面，还是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范式。

52 „Chinese Epigraphy in Thailand: A Preliminary Report“, in: *Chinois d'outre-mer, Actes du XX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Paris, Juillet 1973, Séminaire organisé par Denys Lombard, Paris 1976, pp. 29–53.

53 „A Chinese Tombstone of 1592 found in Pattani“, i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39 (1984), pp. 61–62.

54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Thailand“, 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Vol. II, Kunming 1990, pp. 511–524.

55 傅吾康主编、刘丽芳合编：《泰国华文铭刻汇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饶宗颐序，第1页。

56 前揭廖文辉〈史料、方法、理论——谈马新中文源流“华人研究”主体的建立〉，第25页。

57 傅吾康、陈铁凡编：《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芙蓉：森美兰中华大会堂，1988年。

58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年第一本之第二部分，第231页。

九 附录

傅吾康南亚华文碑铭史料及相关论著

缩略语及刊物说明：

A Aufsatz 论文

B Besprechung 书评

H Herausgabe 主编

M Monographie 专著

NOAG 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Hamburg

OE Oriens Extremus, Hamburg-Wiesbaden

SS Studia Serica, Chengdu

ZDM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 A „Die Han-Zeitlichen Felsengräber bei Chia-ting (West-Ssuchuan)“, SS VII (1948), S. 19-39.
(论文) 嘉定 (川西) 之汉代崖墓
2. A „Gräber aus dem 2. Jahrhundert n. Chr. in Ssu-ch' uan“, Sinologica 2/4 (1950), S. 294-298.
(论文) 四川公元二世纪时的墓葬
3. B Erich Haenisch, Die Ehreninschrift für den Rebellengeneral Ts' ui Lih im Licht der konfuzianischen Moral. Eine Episode aus dem 13. Jahrhundert, ZDMG 102 (1952), S. 174-176.
(书评) 从儒家道德看对叛将崔立的赞誉碑铭 (Erich Haenisch著)
4. B Richard C. Rudolph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n Yu, Han Tomb Art of West China, a Collection of First- and Second-Century Reliefs, ZDMG 102 (1952), S. 423-425.
(书评) 华西汉墓中的艺术品：第一二世纪的浮雕 (Richard C. Rudolph等著)
5. B Wen Yu, Szu-ch' uan Han-tai hua-hsiang hsüan-chi (Sammlung ausgewählter Relief-Bilder der Han-Zeit aus Ssuchuan), OE 4. Jg. (1957), S. 206-207.
(书评) 四川汉代画像选集 (闻宥著)
6. A „Some Remark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on Southeast Asia, with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of the Ming Period, 1368-1644“, in: Southeast Asian Archives (Kuala Lumpur), Vol. 2, July 1969, S. 11-20.
(论文) 对中文史料 (特别是明代) 东南亚部分的一些看法
7. B Ming Shih-lu chung chih Tung-nan Ya shih-liao, 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 Reign Chronicles (1368-1644), Vol. 1, OE 17. Jg. (1970), S. 248-252.
(书评) 《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
8. A „Chinese Epigraphy in West-Malaysia and Adjacent Areas. A Preliminary Report“, Journal of Asian Art, Inaugural Issue, Lee Kong Chian Museum of Asian Culture,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1972, S. 161-172.
(论文) 西马及邻近地区的华文铭刻
9. A „China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in the Modern World, ed. by Bernhard Grossmann, Wiesbaden 1972, S. 347-362.

(论文) 中国对现代东南亚的影响

10. A „Some Remark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in Southeast-Asia “, in: 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Dr. Hsiao Kung-ch' üan, Hongkong 1972, S. 155-167.

(论文) 对有关东南亚的中文史料的一些看法

11. A „Some Remarks on the ‘Three-in-One Doctrine’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 OE 19. Jg. (1972), S. 121-129.

(论文) 对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表现形式的几点思考 (一)

12. A „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 A.D. 1264, 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 A Preliminary Report “, The Brunei Museum Journal 3/1 (1973), S. 91-99 (zusammen mit Ch' en T' ieh-fan).

Chin. Übers.: „Zuijin zai Wenlai faxian de yikuai gongyuan 1264 nian de Zhongwen mubei de chubu baogao “, in: Quanzhou wenshi 9, Quanzhou 1986, S. 150-154.

(论文) 最近在汶莱发现的一块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

13. A „Chinese Epigraphy in Indonesia. A Preliminary Report “,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Nan-yang hsüeh-pao), Singapore, Dez. 1974, 29: 1/2, S. 31-45.

(论文) 印尼的中文铭刻

14. Z (A) „P' o-lo-chou fang-ku-chi “ (Reisebericht über Borneo), übers. von Hu Chün-yin, Nan-yang shang-pao (Kuala Lumpur), 1.1.1975 – 15.1.1975 (laufend).

(报刊文章/论文) 婆罗洲访古记 (中文)

15. V „Chinese Epigraphy in Thailand: A Preliminary Report “, in: Chinois d' outre-mer, Actes du XXI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Paris, Juillet 1973, Séminaire organisé par Denys Lombard, Paris 1976, S. 29-53.

(演讲稿) 泰国的中文铭刻

16. V „710 year old Chinese tombstone discovered in Brunei “, ebd., S. 1-2 (zus. mit Chen Tieh Fan).

(演讲稿) 在汶莱发现的有710年历史之久的中文铭刻

17. A „Jinshi Muming jianshu ji Malaixiya huawen jinshi muming de souji ji yanjiu jilüe “, in: Xuelan' e Zhonghua dahuitang qingzhu wushisi zhounian jinian tekan, Kuala Lumpur 1977, S. 636-642.

(论文) 金石木铭简述及马来西亚华文金石墓铭的搜集及研究纪略 (中文)

18. A „Introduction to: Proceedings of Seminar on Societies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Nov. 1978, S. I-III.

(论文) 东南亚问题研究学会研讨活动: 过去、现在和未来

19. B Mary F. Somers Heidhues, Southeast Asia' s Chinese Minorities, Fridolin Thiel, Die Auslandschinesen und ihr Einfluß in Südostasien, in: NOAG 124 (1978), S. 72-74.

(书评) 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民族 (Mary F. Somers Heidhues著)

20. A „Miszellen von einer Chinareise 1977: Bemerkungen zu einigen Ming-Inschriften “, in: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Bd. 25, München 1979, S. 255-270.

(论文) 1977年游中国杂记: 译释明代几座铭刻

21. A „Zu einigen neueren japanischen Inschriften in Südost-Asien “, in: OE 26 (1979), S. 22-24.

(论文) 在东南亚几份较新的日文铭刻

22. A Preface to: W. Moese, G. Reinknecht, E. Schmitz-Seisser, Chinese Regionalism in West-Malaysia and Singapore, Hamburg 1979, S. XI-XIII.
(论文) 在马来西亚西部与新加坡的华人之地方主义
23. A „Some Remarks on the ‘Three-in-One Doctrine’ and its Manifest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t. II “, in: OE 27 (1980), S. 6-24.
(论文) 对三一教及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表现形式的几点思考 (二)
24. A „Nachtrag zu einigen neueren japanischen Inschriften in Südost-Asien “, in: OE 27 (1980), S. 249-250.
(论文) 对在东南亚几份较新的日文铭刻之增补
25. A „A Note on the Ancient Chinese Mosques at Xian and Quanzhou “, in: Malaiya daxue Zhongwen xi 1980 nian ji 1981 niandu biye jiniankan, Kuala Lumpur 1980, S. 47-57.
(论文) 对西安和泉州的古代中国清真寺的一点说明
26. M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Vol. I,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edited, Kuala Lumpur 1983, (zus. mit Chen Tieh Fan).
(专著) 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 (同陈铁凡合编)
27. A „Notes on some early Chinese and Japanese Block Prints in the East Asia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 in: Papers on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2 (1983), S. 9-28.
(论文) 对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早期中日雕版印刷的几点说明
28. A „Notes on some Ancient Chinese Mosques “, in: Documenta Barbarorum, Festschrift W. Heissig, Wiesbaden 1984, S. 111-126.
(论文) 有关几座古代中国的清真寺的说明
29. A „A Chinese Tombstone of 1592 found in Pattani “, i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39 (1984), S. 61-62.
(论文) 在北大年所发现的一块1592年的中文墓碑
30. M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Vol. II.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edited, Kuala Lumpur 1985 (zus. mit Chen Tieh Fan).
(专著) 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 (卷二, 同陈铁凡合编)
31. A „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and Deities in Northwestern Borneo “, in: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Ostasien, Festschrift für Hans Steininger zum 65. Geburtstag, Würzburg 1985, S. 267-289.
(论文) 婆罗洲西北的中国庙宇和神祇
32. A „Chinesische Religion in Südostasien “, in: Südostasien Informationen 4:2, Bochum, Dez. 1986, S. 6-10 (unter Pseudonym).
(论文) 在东南亚的中国宗教
33. M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 Vol. III,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edited, Kuala Lumpur 1987 (zus. mit Chen Tieh Fan).
(专著) 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 (卷三, 同陈铁凡合编)
34. A „Not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t Ambon – Epigraphic Evidence and Present Conditions “, in: Nanyang yu Zhongguo, ed. by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87, S. 203-214.
Chines. Übers. „Not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at Ambon “, „Anwendao Huaren shequ jianji – Beiwen ziliao yu xianzhuang “, in: Minzu yicong 6, 1988.

- (论文) 安汶岛华人社区简记——碑文资料现状
35. A „Chinese Settlement in North Sumatra as seen from Epigraphic Evidence. A Preliminary Report “, in: *Cultures and Societies of North Sumatra*, ed. by Rainer Carle, Berlin/Hamburg 1987, S. 111-131.
- (论文) 从铭刻之证据看苏门答腊北部华人村落
36. A „Zu einigen chinesischen Kanonen aus dem 19. Jahrhundert in Kota Bharu, Malaysia “, in: *Jiang Weitang xiansheng jiushi rongqing lunwenji*, Festschrift für Dr. Tsiang Fu-ts’ ung zum 90. Geburtstag, Taipei 1987, S. 1-7.
- (论文) 19世纪在马来西亚哥打巴鲁的几门中国大炮
37. *M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 Vol. I: Sumatra,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edited,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88 (zus. mit Claudine Salmon u. Anthony Siu).
- (专著) 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萃编 (卷一)
38. A „Chinese Religion in Southeast Asia with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of Medan, North Sumatra “, i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43 (1988), S. 23-42.
- Chin: Übers.: „Dongnanya de Huaren zongjiao “, in: *Shijie zongjiao ziliao* 2, Beijing 1989, S. 54-57.
- (论文) 东南亚的华人宗教
39. *M Sino-Malaysiana. Selected Papers on Ming & Qing History and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1942-1988*,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89.
- 傅吾康学术论文集
40. A „Die Auslandschinesen in Südostasien “, in: *Südostasien Informationen* 5:4, Dez. 1989, S. 4-9 (unter Pseudonym).
- (论文) 在东南亚的华侨
41. A „Citongcheng he Zhongguo de Haiwai Jiaotongshi Bowuguan “, (Zayton and the Museum of China’ s Overseas Communication History), in: *Haijiaoshi yanjiu* 2, Quanzhou 1989, S. 72.
- (论文) 刺桐城和中国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42. A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Thailand “, i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Vol. II, Kunming 1990, S. 511-524.
- (论文) 泰国华文铭刻资料
43. A „China’ s Overseas Communic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s Reflected in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1264-1800 “, in: *China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UNESCO Quanzhou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 and the Maritime Routes of the Silk Roads*, Fujian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1991, S. 308-322.
- (论文) 中文铭刻材料上所反映出的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外交通
44. A „‘Xishan zazhi’ jiewen zhiyi ju Wenlaiguo Songmu kaoshi’ zhengyin zhi yijie “, in: *Haijiaoshi yanjiu* 20, Quanzhou 1991:2, S. 54-56. Erschienen 1992 (zus. mit Chen Tieh-fan).
- (论文) 《西山杂志》节文质疑——据《文莱国宋墓考释》征引之一节
45. A „Epigraphic Materials and ‘Grey Literature’ as Sources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 Lin Tien-wai (ed.), *Collected Essays on Local History of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Con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S. 473-492. Erschienen 1992.
- (论文) 作为东南亚华人研究之源泉的铭刻资料和“灰色文献”
46. A „The Present State of Collection of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Southeast Asia “, in: *Asian Culture* 16: Singapore, June 1992, S. 46-55.

Chin. Übers.: „Dongnanya huawen mingke ziliao de souji yu chuban“, in: Hanxue yanjiu zhi huigu yu qianzh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95, Vol. 2, pp. 211-219.

(论文) 东南亚华文铭刻资料的搜集与出版

47. A „Luelun Wenlai Songbei xinzheng“, in: Kertas-Kertas Pengajian Tionghoa. Papers on Chinese Studies 5, Kuala Lumpur 1992, S. 7-15 (zus. mit Chen Tieh-fan).

(论文) 略论文莱宋碑新证

48. A „The Sovereigns of the Kingdoms of the Three Mountains, San Shan Guowang, at Hepo and in Southeast Asia. –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 Collected Pape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1994, S. 373-385, 445-446.

Chinesische Inhaltsangabe in: Roufo-zhou Hepo tongxianhui qingzhu shiliu zhounian. Malaixiya Hepo lianhehui diqijie dahui tekan, Kulai, Johor (Malaysia), S. 272.

(论文) 在河婆镇和东南亚的三山国王

49. A „European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at Area“, in: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Han-Shan Tang Books. 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London 1995, pp. 438- 466.

(论文) 欧洲学者在中国和东南亚关系以及东南亚海外华人研究方面的贡献

50. H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 Vol. 2, Part 1 u. 2.: Java. Ed. by Claudine Salmon and Anthony K.K. Siu,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E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Paris, Association Archipel, Paris, 1997.

(主编) 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 (卷二, 第一、二部分)

51. M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 Vol. III: Bali, Kalimantan, Sulawesi, Moluccas.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edited,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997 (zus. mit Claudine Salmon u. Anthony Siu).

(主编) 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 (卷三)

52. M 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Thailand.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edited, Shin Wen Feng Print Co., Taipei 1998 (zus. mit Pornpan Juntaronanont).

(主编) 泰国华文铭刻萃编



北京奥运的国际传播和中国形象的塑造¹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乔木²

【摘要】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的整体认识和综合评价。在现代社会，由于传播的国际化 and 媒体的巨大影响，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通过媒体来塑造。要分析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首先要分析大众传媒对这个国家的报道。奥运会作为世界上最重大、参与国家最多的体育赛事，是媒体竞相追踪报道的全球性媒介盛事，对举办国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是2008年奥运会举办国。中国具有古老的文明，悠久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都是落后而专制。经过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国际上以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在中国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更是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空前的关注。论文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的实证分析，认为即使是奥运会这样的全球性媒介事件也只能影响，但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国家形象。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善和塑造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家形象 北京奥运会

Abstract: National image is the integrated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 certain country. In a mediated world, national image is mainly shaped by media. Olympics, as internationally significant and participated sports games, is a hot event for global media, which is important for the national image. Beijing 2008 Olympics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than ever. What kind

of influence will such an attention exert on China's national image?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New York Times' coverage of Beijing Olympics,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image of China shaped by west mainstream media.

Keywords: National Image, Beijing 2008 Olympics

奥运会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意的全球体育赛事，同时也是规模宏大的全球媒介事件。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吸引了全球36亿电视观众，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电视观众达到了39亿。³如此倍受关注的体育盛事，不仅成为主办国借助媒体向世界展示其形象的极好机会，更是其在国际秩序与世界历史上处于领导地位的宣言。⁴

从申奥到奥运会举办的全过程，奥运传播可以极有效地传播甚至塑造国家形象。事实也证明，举办奥运会这样的全球性体育赛事不仅可以极大地推动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更能改变世界对主办国的看法，塑造并传播新形象。日本从二战后的战败国到经济腾飞重新崛起的形象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契机。而韩国也借1988年汉城奥运会，一跃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北京2008奥运会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意义非凡。

一、世界媒体对北京奥运的关注

2008年8月，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16万名注册的文字、摄影、广播、电视记者以及近万名非注册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课题成果。

2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博士，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3 《第28届：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http://www.olympic.cn/games/summer/2007-10-11/1277096.html>，2008-10-9。

4 Maurice Roche, Mega-events & modernity: Olympics and expos in the growth of global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10.

记者对北京奥运会进行采访报道。这些来自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新华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引领国际舆论的主流媒体,用不同的语言和视角将北京奥运、将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

从电视转播角度看,包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欧洲广播联盟(EBU)、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广播联盟(ABU)等16家奥运特许转播商均派出了强大的转播队伍,制作了累计5000余小时的报道和转播。以其中阵容最为强大的美国奥运独家转播商NBC为例,它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共派出约2900名报道人员,播出了约3600小时的奥运节目,其中直播节目就达2000小时。据美国著名电视收视率研究机构尼尔森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后的10天里,NBC晚间黄金时段的奥运节目每天平均吸引2980万观众,8月11日到17日一周内,其奥运节目每晚的观众人数平均达2870万,不仅夺得每晚黄金时段的收视率冠军,更创下12年来美国夏季收视率的新高。其中8日晚转播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创下了18.6%的收视率,吸引了全美3420万余观众;8月12日晚美国运动员菲尔普斯夺得两块金牌和中美女子体操争夺团体冠军的赛事吸引多达3401万名观众,创美国18年来的收视率记录。⁵

奥运会开幕式在其他各国也创下了较高的收视率,日本为37.7%,西欧各国都达到了20%左右,在澳大利亚,据转播开幕式的电视七台统计,8日当晚全国收看开幕式的观众高达432.6万人。⁶据国际奥委会的官方资料显示,开幕式在中国之外吸引了超过12亿的观众。⁷而尼尔森公司在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所推算的电视观众,约有20亿左右,接近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⁸

在评述北京奥运会的转播情况时,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部部长蒂莫·卢姆称其为“奥运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转播”。他说北京奥运会报道时长、转播商在自己地

区的转播时长以及全球媒体播出的总时长,比以前任何一届奥运会都要多得多,比悉尼多了4倍,比雅典多了3倍,全球范围内有45亿人收看了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和相关的报道。⁹

从报纸报道角度看,包括《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在内的各大报刊都对北京奥运会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大量广泛、密集的报道。作为美国主流报纸之一的《纽约时报》,不仅派出了29人的体育记者团队,还动员该报常驻北京和上海的记者共同参与报道。¹⁰此外,纽约还有许多编辑作后盾,共同进行24小时的滚动报道,并为《纽约时报》集团旗下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波士顿环球时报》及其他15份地区报纸供稿。¹¹在奥运会开幕前的8月4日,《纽约时报》出版了多达12页的奥运专版,刊登了多篇介绍北京奥运会的文章,并配有大量彩色照片。5日该报头版中心位置的图片即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在其它各版面也均有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在随后的三个星期,《纽约时报》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更是浓墨重彩,不惜版面,几乎每天都有十篇以上的长文。《泰晤士报》虽然相比之下数量较小,但与同期其他主题的文章数量相比,已占据明显优势,彰显出其对北京奥运的高度关注。

此外,新媒体的活跃也增加了北京奥运会的受关注度。在网络最发达的美国,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将奥运报道与手机资讯结合起来,订阅雅虎手机咨询服务的用户只要下载雅虎专门的北京奥运插件,在奥运期间就可以随时随地地收到相关的新闻。NBC除了每天6个频道的高清晰电视转播节目外,还开设了网络赛事转播、每日赛事回顾与分析、以及赛事博客等。而《纽约时报》的网站除了奥运专栏之外,还专门设立了“Rings”博客,其众多的记者不仅更新奥运新闻,更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

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世界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成功地将议程设置于北京奥运会。正如8月4

5 《北京奥运会成“眼球率”最高的一届奥运会》,中国青年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8/21/content_9563798.htm

6 同上。

7 同上。

8 Beijing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Over 2 Billion Viewers Tune In, http://www.nielsen.com/media/2008/pr_080814a.html 2008-10-4

9 《北京奥运会成“眼球率”最高的一届奥运会》,中国青年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8/21/content_9563798.htm 2008-10-4

10 《《纽约时报》感受新北京 奥运会报道人数创历史》,东方早报

11 《媒体盛宴:人民日报邀外媒负责人出席奥运开幕式》,人民网

日《纽约时报》奥运会专版的头版文章“中国时刻”所述：“在今后的三个星期里，这些奥运比赛的意义将跃出比赛场馆，它们将是对一个国家的全民投票。”¹²也就是说国际媒体的目光不仅是关注奥运会本身，更是关注整个中国的方方面面。那么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它们又会塑造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呢？

二、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

奥运期间，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涉及包括体育在内的各个方面。以著名的《纽约时报》为例，在其网站以“2008北京奥运会”为关键字做模糊检索，可发现从2008年8月4日（《纽约时报》开辟奥运专版）到2008年8月25日（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的后一天），《纽约时报》共有关于北京奥运的报道284篇，广泛分布在体育、财经、技术、社会、国际事务、言论、特写等栏目和领域。

从内容主题来看，280篇报道（除去相关性不甚紧

密的4篇）主要覆盖了奥运开闭幕式、各项赛事的比赛情况、比赛场馆以及运动员、金牌榜、商业赞助、转播商、志愿者、北京奥运期间的治安管理、空气、天气、环境、交通状况以及外地来京务工者面临的境况问题、奥运会兴奋剂监测以及运动运性别鉴定、与邻国关系、激进主义者的鉴证问题、新疆暴力事件、北京的申奥历史、新媒体的应用、中国民众对奥运会的反应、奥运期间的结婚热、格鲁吉亚问题、现身奥运会的各国领导人等各个方面。

从报道倾向来看，开幕式前期报道主题不集中，且负面报道偏多，对人权、宗教、西藏等西方媒体一贯关注的问题表示疑虑，对北京的空气、国外激进主义者的签证问题等也有所不满。开幕式以后，报道重点逐步转向赛事报道。中性报道增多，不同观点的评论和分析加大。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284篇报道中的19篇评论：

类别	数量	文章标题	发表时间	文章内容
特约评论	3	重重包裹下的北京	8.4	北京管制网络、出版、城市游民，拒绝激进主义者
		菜单上狗肉太火爆	8.4	北京明令禁止餐馆菜单上与狗肉有关的菜，禁止市民随地吐痰以迎接奥运和西方观众
		中国向金牌冲击	8.6	为夺金牌，政府大批量“制造”运动员
专栏作家	7	来自达赖的橄榄枝	8.7	达赖表示了让步，中国政府也该报之以李
		我在北京唱歌	8.14	开幕式假唱，台前幕后小演员均受伤害
		奥运之后是西藏问题	8.14	达赖抛出了橄榄枝，中国政府应报之以友好协商的态度
		内容不妥无须申请	8.17	奥运期间所谓的集会、游行自由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但能够申请并且有人申请毕竟在进步
		俄罗斯不是牙买加	8.17	和俄罗斯一样，中国也正显示出参差不齐的专制独裁主义。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限于金牌榜	8.20	中国各个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均在增强，美国应与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
		大熔炉与万里长城的相会	8.24	中美两大奖牌赢家各有赢的秘诀，有值得对方学习的地方，但美国绝对不能学习中国的专制

12 China’s Moment: Referendum on a Nation,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08/08/04/sports/olympics/04vecsey.html?pagewanted=all> 2008—10—4

报纸社论	5	空气污染，要礼貌，可能会下雨	8.6	北京要求市民只穿黑白两色的衣服，不穿睡衣上街，不问外国人婚姻经济状况；北京的空气不达标，北京强令工厂和建筑工地停工，甚至以人工降雨洗刷空气
		裁过边的奥运会	8.14	高科技、新媒体的应用
		我们的金牌梦	8.17	中国在金牌榜领先美国，因为其运用在美国不可能接受的策略：强把年弱的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让其接受残酷的训练，不让金牌运动员退役，虚报运动员的年龄以使其取得参赛资格
		北京奥运会	8.23	北京对奥组委的承诺并未兑现，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很糟
		追求金牌	8.24	奥运会的状况和二十年前一样，金牌榜仍是强国富国的领地
读者来信	4	呛着，咳着，奥运会终于上映了	8.8	北京的空气状况就是很差，戴口罩的运动员为什么要道歉？
		国外的节能技术	8.14	中国的节能技术很先进，应用很宽泛
		通往辉煌之路：独行还是结伴	8.14	美国的个人主义未必不好，中国的集体主义是政府专制下的虚假集体主义
		奥运会改变中国了吗？	8.23	虽然中国逐渐成为强国，但其仍然无视民权

分析其内容可见，19篇评论中有8篇是对中国进行了比较中性或正面的评价，认为中国节能技术很先进应用很宽泛，中国在体育、科技、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剩下的11篇（包括四篇读者来信）均是负面评价，其中代表报刊观点的5篇社论中就有3篇极端负面的评价，认为政府实施专制统治，任意蔑视民权，中国的人权状况极其糟糕。

《纽约时报》是公认的美国极具影响力的报纸，它设置的新闻议题和导向经常为其他同行，包括电视、广播以及网络所认同和接受。¹³ 因此，《纽约时报》的报道基本可以反映出美国媒体对北京奥运报道的选材偏好和批评倾向。而这种报道倾向所体现出的中国形象是：一个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迅速的国家，但在政治上仍然极权专制，环境和人权问题很糟。

三、结论

尽管媒体引用奥委会主席罗格的“无与伦比”盛赞北京，但北京奥运会期间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与奥运

前相比并无本质改变，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说：“透过奥运呈现的中国非常强大，不过奥运没有改变历史，它仅仅是快照：一个国家摆出最好的节日姿势让全世界看”。¹⁴ 由此可见，即使是奥运会这样的全球性媒介事件也只能暂时影响，但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国家形象。能否实现国家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是确立国家形象的关键。

有很多因素影响媒体的国际报道：国际关系、意识形态、新闻价值、传播距离、文化差异等。通过国际媒体对北京奥运的报道，可以认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中国的悠久历史、古老文明是其固有的形象，近代史上又伴随着贫穷、落后的阴影。如果说东京奥运会反映了日本经济上的成就，汉城奥运会超越经济奇迹，展现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的成果，北京奥运会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转型的未来。

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可以取得经济的繁荣，但其实现方式、政治结构和社会变化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中国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历史复杂，其国际形象的展现会更为多样而具有活力。

13 Dearing, J.W. & Rogr, E.M. (1996). *Agenda-Sett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14 Thomas L. Friedman, "A Biblical Seven Years",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8/27/opinion/27friedman.html?scp=3&sq=Thomas%20L.%20Friedman%20%20Olympic%20change%20history%20&st=cse> 2008-10-10.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栖庆 赵宗锋

编辑 谷晨曦 王惠英

装帧设计 蔡颖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